

弘扬义理 重建道统

——《国学》发刊词

国学是中华历史、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艺术、中华传统学术的统称，是与“西学”相对而存在的“中学”。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我认为，国学与中国学(汉学)至少有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国学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研究和教育而形成的学术文化体系，而中国学则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哲学等方方面面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学术文化体系；国学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大地上存在的所有学术文化及其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存在形态；而中国学则既包括鸦片战争前的所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也包括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地上存在的所有学术文化。国学是以汉族为主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国学不应将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排斥在外。

国学研究中存在着三大问题需要克服：一是自满清以来重辞章之学、考据之学而忽视义理之学的传统，至今没有得到扭转。二是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严重脱节，国学学科建设与国学课程建设严重脱节。国学专家的著作基本上一般人不会去读，儿童经典教育用的都是没有经过研究、整理、阐释的原著版本。三是将国学作为过去的、客观的、对象化的知识来研究，忽视国学的修身、践行、实践、运用。希望《国学》期刊能纠正以上三个问题。

国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首先支起西方文化的框架，然后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填充的材料，填塞进去。凡是能够塞进去的就被作为真理；凡是塞不进去的就被作为废弃物，弃之一旁。这样，一部中国思想史，实际上也就成了西方中国思想史。对于中华文化中的大量名词和概念，应当通过整理和简化，确定这些概念的固定名称，明确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存在着大量的经典语句，存在着大量的思想片断，虽然没有现成的框架结构，但这些思想片断并不是凌乱的，而是具有内在的隐性结构。我们必须通过认真的研究，探索这种内在的隐性结构，并使这种隐性的结构变为显性的结构。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应当确立中华文化评价、奖励体系，放弃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采取中华文化自身应有的评价标准，正确引导中华文化的发展。

传统国学中有辞章、考据、义理，辞章偏重于语言文字与文学，考据偏重于历史与文化事实，义理偏重于哲学与精神。我认为，现代国学可以分为中华义理、中华史学、中文、中华宗教（儒、佛、道三教）、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术数、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等。其中，中华义理、中文、中华历史是国学核心学科，其它则为国学一般学科。以上学科具有独立的地位，各自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我们反对把以上学科进行分解，使之丧失独立性，然后将分解后的碎片，纳入到西方的文化体系中去，将以上各学科的材料，作为西方文化各学科的填充物。

与上述国学学科分类相应，设立国学课程。国学课程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中华义理：将中华义理建设成为一门贯穿小学、中学、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中华义理是理论与精神的结合体，应当将中华义理的学习同学习中华文化的某一具体科目结合起来，同中华人文礼教的教育结合起来，同中华历代圣贤英杰的人生经历的学习结合起来，同优秀古典诗文的诵读结合起来，归根结底落实为人的践行。注重对精神的领悟而不是对史实的大量占有，注重实效而不是空洞的说教。

二是中华历史：中华历史课程必须以文明史、思想史、文化史为中心，必须以人生课题、人生智慧为重点内容，应当以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为主要目的，以培养中国人的认同感、爱国心、公民素质、道德为宗旨，以圣贤、英雄作为楷模。

三是中文：中文包括语言文字与文学两大方面。中国古代诗文应成为教育的重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领悟中华文化的载体，保持中华民族在语言方面的共同意识，维护中文的纯洁性与神圣性。

中华义理、中文、中华历史应当是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

四是国学一般课程：中医养生、书法、国画、术数、中华音乐、中华歌舞、中华戏曲、古典诗文、武术、中华民俗、中华人文礼教、中华建筑园林、中华工艺、中华饮食、围棋、象棋等，学习者可以任选其中一个科目。学习者通过对所选科目的学习，通过某一具体的科目来领悟中华文化精神。

国学不仅仅生存于研究领域，不仅仅为少数专家学者所知。国学必须跳出狭隘的研究领域，进入大众教育领域，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如果不走这样一条道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华义理是国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是国学的核心，是国学的灵魂。如果缺乏中华义理，国学就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缺乏精神内涵，就会形式化、空壳化，缺乏生命力，缺乏与大众沟通的精神因素，必然走向衰落。反之，如果中华义理不同国学的其他学科相结合，则丧失自己的生存之地，找不到表现自己的方式，变得虚玄，走向空谈心性的道路。研究和传播国学，不是走复古道路，而是回到传统文化、艺术中去找寻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并在现代兼容的条件下复现出来，成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国学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时代性。

按照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可以正确处理国学同马克思主义，国学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只要摆正它们的位置，它们就会产生互补的作用，建立兼容的关系。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西方的优秀文化如果要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就必须置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上。

中国古代的教育，只注重儒家文化经典的学习，将人的知识视野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废除读经之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了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学习。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中华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义理学的管道被阻断。

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义理必须以文化经典为归依，道存在于经中，因此，获取义理的途径是：“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离开了经典，中华义理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对于文化经典，阐明义理为目的，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

中华义理是中华精神价值体系。这一精神价值体系包括六大方面，即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人文精神、生存智慧、人生哲学、民族精神、价值观念。这六大方面相互交织，形成有机整体。

中华义理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仁人志士以自己的生命践行而结出的累累硕果。孔子思想，绝非个人的主观意见，而是在整理、阐释、传播古代文化经典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体系的最集中、最全面的表达。

中华义理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儒、道、佛各家各派的思想精华，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有价值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不断地补充、发展、丰富这一精神价值体系。我们应当超越时空限制，超越流派限制，将他们的优秀思想抽取出来，作为构建义理学大厦的具体材料。义理学是剔除了等级观念、专制作风、男尊女卑、特权意识、奴性思想等封建糟粕之后，能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所用的思想精华。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中华义理，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大的损失是中华义理的丧失，中国当代最迫切而又没有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需要也就是中华义理的重建。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西方文化的观念、结构、逻辑、概念来研究，将中国文化材料作为西方文化框架的填充物。这种研究方法造成了对义理学的忽视和疏漏。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义理学的内容就会被肢解，部分内容就会被分别分配到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上去，不能被分配的部分就会被作为多余的东西抛弃。在攻击中华文化的强大势力和现代知识学科的挤压之下，义理学的学统已告中断。

中华义理应当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人生哲学、生存智慧、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是一个相互交错、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因而有必要建立义理学这样一门综合性学科以统摄之。拙著《中华义理》、《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国学复兴方略》，依据传统文化资源，基本上确立了义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要点、逻辑结构、思想体系，为将义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作了初步的努力。

如果说《国学》期刊与其它同类刊物有根本不同之处，那么，这种不同就是，《国学》期刊应以弘扬中华义理、重建中华道统为最重要的使命。

陈杰思

2013年8月26日